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动态减贫效应及其机理分析

——基于消费与收入流动性双重视角的实证检验

郭君平 曲 颂 夏 英 宁爱照*

内容提要 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的三轮农户跟踪调查数据,本文利用有序 logit 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消费和收入流动性双重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边际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具有显著的动态减贫效应。在消费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能显著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 16.4%),其作用路径是使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减缓至暂时性消费贫困,而另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直接脱贫;在收入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明显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依序下降 10.3%和 2.9%),其减贫机理相对更复杂,除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外,还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先减缓至暂时性收入贫困后再完全脱贫,余下其他农户则从暂时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

关键词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 消费流动性 收入流动性 动态减贫效应 作用机理

一 引言

传统的贫困研究通常以预设的贫困线为标准,基于某一时点或相对较短时期(一

* 郭君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 guojunping@caas.cn; 曲颂(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 qusong@caas.cn; 夏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 xiaying@caas.cn; 宁爱照,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 ningaizhao@caas.cn。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农村信息化减贫能力提升研究”(批准号: 15CTY048)、博士后面上项目“‘互联网+’战略背景下精准化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研究”(批准号: 2015M580180)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支持农村扶贫项目扶贫方式研究——社区综合能力建设”(批准号: TA3150)的资助。

一般为一年)的截面数据,来刻画特定时点下城乡居民的贫困特征,测算某区域内贫困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以及对比总体或个体在不同时点的贫困状态,其本质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分析思路。相较之下,贫困的动态性研究是从时间维度或风险视角分析个人和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如进入、停留或脱离)及其致因(洪兴建、邓倩,2013;杨慧敏等,2016),抑或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贫困人口结构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轨迹或动态分布进行长期分析,其目的重在识别导致贫困的系列事件,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上度量和区分慢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为政府设计可促使贫困状况良性变动的减贫方式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已发生显著改变,但是暂时性贫困户的比例日益提高,且慢性贫困户在当前“脱贫困难户”中所占比重较大。审视既往,中国减贫实践的思路、对策以及效果均与贫困类别密切相关,即扶贫方式或政策措施对暂时性贫困与慢性贫困的干预效果差异明显,其中,能有效缓解慢性贫困的扶贫方式和政策措施对于暂时性贫困的缓解效果却差强人意。尽管经过多年人、财、物及其他资源的大量投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然而即便如此,多数脱贫农户并未实现稳定脱贫或消除经济脆弱性,他们仍面临诸如疾病、意外事故、子女上学、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不稳定非农就业等各种生计风险的冲击,在尚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下,不少抵御风险能力差的脱贫农户或将因此福利水平下降,甚至重陷贫困境地。作为一种在中国实践了十余年的区域性减贫方式,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以实现农村纯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目标载体,以列入有关部门外资项目引进计划、中央或地方政府“整村推进”计划和国家机关单位对口帮扶计划的贫困村(社区)为瞄准单元,通过整体改善贫困村(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村户的发展能力等方式来减缓贫困。

基于以上分析和考量,本文利用跨期十余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消费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双重视角,着重剖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这对如何因地制宜实施可动态瞄准的贫困干预措施以解决当前农户脱贫返贫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经文献梳理,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涉及贫困动态变化、农户生计资本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但截至目前,以上三方面内容相互独立,尚未被学界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其中, 贫困动态性的开创性研究源自 Hill (1981) 和 Bane & Ellwood (1986)。在 20 世纪 90 年代, 虽有不少学者逐渐强调区分长、短期贫困的重要性, 但因发展中国家缺少农户层面的时序数据或面板数据, 致使这些国家的贫困研究一直以静态方法为主, 贫困动态性研究寥寥可数 (Chaudhuri & Ravallion, 1994; Herrera & Roubaud, 2005)。然而, 近十余年, 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和微观面板数据的涌现, 贫困问题研究注重结果却忽视过程的情况有所改观, 贫困的动态性分析已升至新的高度且成为学界热点, 很多学者对此作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

时下, 就此领域的研究进展而言, 可集中归纳为两部分: 第一, 贫困动态的概念、度量、分类、特征、发生率、决定因素、治理对策及其政策评价。以贫困的动态分类研究为例, 通常依据家庭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经历贫困的时间长短, 将总体贫困分解为暂时贫困和持久性贫困 (张清霞, 2008)^①。更甚者, Hulme & Shepherd (2003) 以时间为轴将贫困细分为永远贫困、经常贫困、胶着贫困、偶尔贫困以及非贫困五种形态。第二, 农户贫困动态演变的影响因素。除少量专家在生命周期框架内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外, 多数学者运用计量模型探究家庭贫困跨期变动的因素。结果发现, 户主民族、人口结构、性别特征、就业状况、人力资本、实物资产、基期收入、税收政策以及转移支付政策等对农户中长期贫困状态的脆弱性及其变化影响显著 (于敏, 2011; 姚毅, 2012; 周振、兰春玉, 2014)。

尽管国内外以农户生计资本为核心的研究汗牛充栋, 但将其与动态贫困融合分析的“专论”目前极为稀少。生计资本主要以人为中心, 包括家庭生活所需资产、个人能力及其实际行动, 是农村贫困家庭脱贫的有利因素。不同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多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五种生计资本本身水平高低各异, 二是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和不同类型村庄农户生计资本构成存在较大差异性 (蔡志海, 2010)。2000 年, 英国国际发展署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简称 DFID) 指出, 农户生计资本运行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生计策略的选择及其所致的生计结果。优质、高效生计资本是农户降低生计脆弱性、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 (杨云彦、赵锋, 2010; 伍艳, 2015), 生计资本匮乏的农户, 其持续增收难度和贫困脆弱性都将增大 (陈健生, 2009; 郭圣乾、张纪伟, 2013; 伍艳, 2016)。因此, 农户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

^① 持久性贫困是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 暂时贫困是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围绕贫困线上下波动, 但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高于贫困线, 唯有某些短暂时期才陷入贫困; 非贫困是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所有时期内均超过贫困线。

若要消除慢性贫困达到发展目标，应促使自身生计资本尽可能多样化，以实现生计目的和可持续生存愿望（Baumgartner & Hogger, 2004；何仁伟，2014）。

至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相关文献十分有限。据既往少量研究表明，该减贫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展开，在完善社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质量方面成效突出（郭君平、吴国宝，2013，2014；徐晓鹏，2016）。然而，学界迄今未能从消费或收入流动性维度分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慢性贫困或暂时性贫困的不同干预效果。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既有可借鉴之处（提供了特定视野和概念框架），又有其局限性——学界对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几无关注。也正因为如此，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的边际贡献为：

第一，分析框架新。一方面，从动态角度细分贫困群体，属于动态贫困研究而非静态贫困研究；另一方面，收入贫困并不等同于消费贫困，两者虽有“交集”，但存在本质区别^①。本文一改过去单一以收入为贫困判定的标准，将“收入与消费”两个维度和“慢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及非贫困”三个维度进行交叉，最终形成六维贫困分析架构。第二，研究内容新。从村级区域减贫层面，尝试以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二维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要探讨内容。第三，政策含义新。所得规律性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突出体现在扶贫政策的制定须考虑到动态层面的贫困状况并兼具差异化特征。

三 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与变量设置

为反映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与农户贫困状态类型之间的变化关系，基于 DFID（2000）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F），重点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所引致的农户贫困动态变化显然是新的视角。结合调研的实际情况、数据可获得性和以往研究结论，本文共选取 14 个控制变量（见表 1），分别对应 5 类生计资本：

第一，物质资本，指农户用于生产、生活的公共设施和物质设备（李小云等，2007）。家庭资产状况在时间维度下既能刻画出农户财富积累，也可准确反映其脱贫能

^① 基于收入与消费两个维度可形成三种贫困状态：一是收入贫困但消费非贫困（为当前某特殊目的借钱或超前消费）；二是消费贫困但收入非贫困（为将来某特殊目的刻意缩减当下消费支出）；三是收入消费双重贫困（经济能力微弱且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力或是否陷入慢性贫困，加之生产资源愈充沛，农户增收潜力愈大，脱贫概率越高，为此，择定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和人均房屋价值为测量指标。

第二，金融资本，指农户可支配、可筹措的现金，包括自身现金收入、所得贷款（正规或非正规渠道）以及无偿援助等（蔡志海，2010）。文中拟用人均存款和人均借贷金额为代理变量，前者直接影响农户家庭是否贫困，后者可反映贫困农户贷款难或贷不到款的问题。

第三，自然资本，指农户拥有或能长期使用的土地，不仅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最重要的自然资产（杨云彦、赵锋，2010）。土地在贫困地区是短边要素，农户耕地、林地面积充裕（或贫瘠）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收入增长、贫困几率和贫困时长，故以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

第四，人力资本，包括健康、知识、技能、劳动能力以及适应能力等，是农户生计的基础和其他资本的核心，其“质”和“量”决定了农户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刘恩来等，2015）。在农村反贫困研究中，农户人力资本及其投资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以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为主要代表的人力资本对改善农户贫困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从广义上择定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人口规模、户劳动力数量、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以及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为观测变量。

第五，社会资本，指农户为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包括加入的社区组织和个人构建的社会网络（郭圣乾、张纪伟，2013）。家庭社会资本投资力度越大（人情往来和通讯费用支出越多），社会关系或网络越丰富（在外务工人数或城镇亲朋好友越多），农户贫困发生的概率越低（丁冬等，2013；关爱萍、李静宜，2017），因此，选取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和家庭是否兼业作为代理变量。变量设置及样本特征详见表1。

表1 变量释义及样本基本特征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消费贫困动态类型(均值)			收入贫困动态类型(均值)		
		慢性消费 贫困户	暂时性消费 贫困户	非消费 贫困户	慢性收入 贫困户	暂时性收入 贫困户	非收入 贫困户
消费贫困动态类型	有序变量 非消费贫困=1 暂时性消费贫困=2 慢性消费贫困=3	—	—	—	—	—	—
收入贫困动态类型	有序变量 非收入贫困=1 暂时性收入贫困=2 慢性收入贫困=3	—	—	—	—	—	—

续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消费贫困动态类型(均值)			收入贫困动态类型(均值)		
		慢性消费 贫困户	暂时性消费 贫困户	非消费 贫困户	慢性收入 贫困户	暂时性收入 贫困户	非收入 贫困户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	是否实施 是=1 否=0	0.358	0.338	0.673	0.269	0.404	0.538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 原值(万元)	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 原值/户人口	0.020	0.023	0.032	0.017	0.023	0.028
人均房屋价值 (万元)	年末房屋价值/户 人口	0.109	0.172	0.325	0.074	0.152	0.267
人均存款(万元)	(银行存款+手存现 金)/户人口	0.013	0.031	0.029	0.013	0.014	0.036
人均借贷金额 (万元)	借贷总额/户人口	0.021	0.022	0.052	0.012	0.018	0.047
人均耕地面积 (亩)	耕地总面积/户人口	0.635	0.759	0.735	0.681	0.576	0.823
人均林地面积(亩)	林地总面积/户人口	0.144	0.180	0.469	0.158	0.135	0.370
户主年龄(岁)	数值变量	47.745	54.549	48.982	52.327	48.573	50.374
户主受教育程度 (年)	受教育年限	2.651	1.944	4.291	2.000	2.966	3.154
户人口规模(个)	数值变量	4.434	4.113	3.818	4.154	4.382	4.022
户劳动力数量(个)	数值变量	2.392	2.627	2.500	2.356	2.365	2.687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万元)	医疗保健总支出/户 人口	0.004	0.007	0.016	0.004	0.006	0.012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万元)	文教娱乐总支出/户 人口	0.004	0.009	0.029	0.005	0.006	0.020
人均交通通讯支出 (万元)	交通通讯总支出/户 人口	0.004	0.007	0.017	0.003	0.006	0.012
家庭是否兼业	虚拟变量 是=1 否=0	0.632	0.718	0.836	0.558	0.708	0.791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2003年和2011年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依托亚洲开发银行贵州纳雍社区综合发展扶贫示范项目，以当地两个极贫村1999年、2003年和2011年的追踪调查户为分析样本。在项目开始前（1999

年),处理组(千秋村)和对照组(碓窝河村)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当。其中,处理组安排了全面的基础设施(如饮水、灌溉、社区道路、供电、泥石流治理等基础设施及维护管理)项目、社区发展基金以及村户能力建设等;对照组则未开展任何扶贫项目。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人口特征、从业情况、财产、生活设施、土地、农业技术应用、收入来源、消费支出、储蓄、借贷、技术培训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在剔除无效或缺失有效信息的问卷后,得到1019份高质量问卷。经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优良,所有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均超过0.83,且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均较高。

2. 贫困动态性测量

基于跨期追踪的面板数据,文中将慢性贫困户界定为在1999年、2003年和2011年这三个调查年度内至少有两年处于消费贫困或收入贫困的农户;暂时性贫困户特指在上述三个调查年度内只有一年处于消费贫困或收入贫困的农户;非贫困户特指家庭人均纯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在以上三个调查年度均超出预设贫困标准的农户^①。其实质是考察一段时期内家庭陷入贫困的次数,以此判断贫困程度或类型,作为贫困动态性的研究起点(周振、兰春玉,2014)。根据家庭经历贫困的时间长短、进出贫困的频次以及收入或消费维度,样本户可细分为慢性消费贫困户和慢性收入贫困户、暂时性消费贫困户和暂时性收入贫困户、非消费贫困户和非收入贫困户等六个群体。换言之,在收入和消费维度下,农户总收入贫困可分解为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总消费贫困可分解为慢性消费贫困与暂时性消费贫困。

3. 计量模型选择

结合前文讨论内容,构建以下回归方程以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农户贫困动态类型的转化:

$$DyPovC = \alpha_0 + \alpha_1 Community + \alpha_2 FinancialC + \alpha_3 PhysicalC + \alpha_4 NaturalC + \alpha_5 HumanC + \alpha_6 SocialC + \varepsilon \quad (1)$$

上式中, $DyPovC$ 为两个因变量,表示农户所处消费贫困动态类型或收入贫困动态类型; $Community$ 表示是否实施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系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其取值1或0时分别代表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所有控制变量中, $FinancialC$ 表示一组金融资本变量, $PhysicalC$ 指代一组物质资本变量, $NaturalC$ 为一组自然资本变量, $HumanC$ 指代一组人力资本变量, $SocialC$ 为一组社会资本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为 $Community$ 的回归系数, α_2 、

^① 文中贫困标准分别为1999年、2003年和2011年的绝对贫困线(以1999年为基期扣除物价因素),即年人均625元、617.79元及2140.93元。

α_3 、 α_4 、 α_5 和 α_6 为五种生计资本变量向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 ε 为随机扰动项。鉴于贫困动态类型为多分类有序变量，文中先用有序 logit 模型来估计且仅报告自变量的边际效应。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将前述因变量转变为农户陷入消费贫困或收入贫困的次数，然后用其他替代方法重新估计。由于所用样本持续了若干年，因此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来考察一定时期内农户陷入收入（或消费）贫困次数的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更有意义。该模型基于负二项分布来拟合计数数据，且利用相乘随机项（ $\mu\nu$ ）代替泊松分布中的参数 μ 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从而解决泊松回归模型的过度分散性问题。此时，假设 $y \sim \text{poisson}(y | \mu\nu)$ ，将 ν 设定为： $E(\nu) = 1$ ， $\text{Var}(\nu) = \sigma^2$ 。可得到 $E(y) = \mu$ ， $\text{Var}(y) = \mu(1 + \mu\sigma^2) > \mu = E(y)$ 。当 $\nu \sim \text{Gamma}(1, \alpha)$ 时， y 服从于负二项分布，其概率密度为：

$$\Pr(Y = y | \mu, \alpha) = \frac{\Gamma(\alpha^{-1} + y)}{\Gamma(\alpha^{-1})\Gamma(y + 1)} \left(\frac{\alpha^{-1}}{\alpha^{-1} + \mu} \right)^{\alpha^{-1}} \left(\frac{\mu}{\mu + \alpha^{-1}} \right)^y \quad (2)$$

简言之，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放松了泊松回归模型均值等于方差的假设，因而比泊松回归模型更加灵活（孙梦洁、韩华为，2013）。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消费贫困动态变化

如表 2 所示，模型 I 中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只对农户消费贫困动态类型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进行回归；模型 II 则在模型 I 的基础上加入全部农户生计资本因素。结果表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暂时性消费贫困和非消费贫困均影响显著，且边际效应值依次为 -0.164、0.050 和 0.114，这表明实施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使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降低 16.4%，而使其处于暂时性消费贫困和非消费贫困状态的概率分别提高 5.0% 和 11.4%。据此可知，上述模型揭示了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缓消费贫困的两条路径，即“慢性消费贫困→暂时性消费贫困”和“慢性消费贫困→非消费贫困”。

模型 II 中其他控制变量同理。从农户生计资本对消费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来看，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暂时性消费贫困以及非消费贫困有显著影响，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等因素均无统计显著性。其中，人力资本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影响显著，但对农户暂时性消费贫困和摆脱消费贫困并无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 1.9%；户人口规模对农户消费贫困动态类型存在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每增多

1人,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增大6.6%,而处于暂时性消费贫困和非消费贫困的概率降低2.0%和4.6%;户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暂时性消费贫困和非消费贫困均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每增多1人,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降低7.3%,处于暂时性消费贫困的概率提高2.2%,而摆脱消费贫困的概率提高5.1%;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暂时性消费贫困以及非消费贫困的作用均显著,即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每增加1万元,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降低4.438倍,但处于暂时性消费贫困和摆脱消费贫困的概率分别增大1.342倍和3.096倍;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和非消费贫困影响显著,但对暂时性消费贫困无显著影响,即人均文教娱乐支出每增加1万元,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2.127倍,而摆脱消费贫困的概率提高1.484倍。社会资本方面,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与非消费贫困影响显著,人均交通通讯支出每增加1万元,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

表2 消费贫困动态变化的边际效应

变量类型	自变量名	消费贫困动态类型					
		慢性消费贫困		暂时性消费贫困		非消费贫困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	模型 II
核心自变量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	-0.220***	-0.164**	0.050***	0.050**	0.169***	0.114**
物质资本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	-0.342	—	0.104	—	0.238
	人均房屋价值	—	0.113	—	-0.034	—	-0.079
金融资本	人均存款	—	0.182	—	-0.055	—	-0.127
	人均借贷金额	—	0.168	—	-0.051	—	-0.117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	-0.078	—	0.024	—	0.055
	人均林地面积	—	-0.034	—	0.010	—	0.024
人力资本	户主年龄	—	-0.005	—	0.001	—	0.003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019*	—	0.006	—	0.013
	户人口规模	—	0.066***	—	-0.020***	—	-0.046***
	户劳动力数量	—	-0.073**	—	0.022**	—	0.051**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	-4.438***	—	1.342**	—	3.096***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	-2.127*	—	0.643	—	1.484*
社会资本	人均交通通讯支出	—	-3.775*	—	1.142	—	2.633*
	家庭是否兼业	—	-0.185***	—	0.056***	—	0.12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稳健标准误未给出。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2003年和2011年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的概率降低 3.775 倍，而摆脱消费贫困的概率增大 2.633 倍；家庭是否兼业对农户慢性消费贫困、暂时性消费贫困和非消费贫困均有显著影响，即家庭兼业可使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 18.5%，处于暂时性消费贫困的概率提高 5.6%，而摆脱消费贫困的概率提高 12.9%。

（二）收入贫困动态变化

与上文同理，表 3 的模型Ⅲ中未加入其他任何控制变量，只对农户收入贫困动态类型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模型Ⅳ添加了所有农户生计资本因素。结果显示，核心变量“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以及非收入贫困均影响显著，相应边际效应值依次为 -0.103、-0.029 和 0.132，其含义是实施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使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分别降低 10.3% 和 2.9%，农户摆脱收入贫困的概率相应增大 13.2%。由此不难发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缓收入贫困的路径或机制是：“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非收入贫困”和“慢性收入贫困→非收入贫困”。

表 3 收入贫困动态变化的边际效应

变量类型	自变量	收入贫困动态类型					
		慢性收入贫困		暂时性收入贫困		非收入贫困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Ⅲ	模型Ⅳ
核心自变量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	-0.158***	-0.103**	-0.049***	-0.029*	0.207***	0.132**
物质资本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	0.241	—	0.067	—	-0.308
	人均房屋价值	—	-0.046	—	-0.013	—	0.059
金融资本	人均存款	—	-1.253*	—	-0.348*	—	1.601*
	人均借贷金额	—	-0.447	—	-0.124	—	0.571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	-0.146**	—	-0.040*	—	0.186**
	人均林地面积	—	-0.012	—	-0.003	—	0.016
人力资本	户主年龄	—	0.002	—	0.001	—	-0.003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004	—	-0.001	—	0.005
	户人口规模	—	0.023	—	0.006	—	-0.029
	户劳动力数量	—	-0.056**	—	-0.015*	—	0.071**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	-2.025	—	-0.563	—	2.588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	-0.767	—	-0.213	—	0.981
社会资本	人均交通通讯支出	—	-0.441	—	-0.123	—	0.563
	家庭是否兼业	—	-0.139***	—	-0.039**	—	0.17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稳健标准误未给出。

资料来源：根据 1999 年、2003 年和 2011 年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再者,从其他控制变量对收入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来看,除物质资本因素外,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户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以及非收入贫困状态均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方面,仅人均存款对农户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影响显著,人均存款每增加1万元,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分别降低1.253倍和34.8%,而摆脱收入贫困的概率提高1.601倍。自然资本方面,也只有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均有显著影响,即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分别降低14.6%和4.0%,摆脱收入贫困的概率相应增大18.6%。人力资本方面,仅户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均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每增多1人,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5.6%和1.5%,相反摆脱收入贫困的概率提高7.1%。社会资本方面,仅家庭是否兼业对农户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影响显著,即兼业可使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13.9%和3.9%,而摆脱收入贫困的概率相应提高17.8%。

(三)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贫困动态变化影响效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NBR)和线性概率模型进行检验。表4显示,核心自变量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减缓农户慢性收入贫困和慢性消费贫困,同时,也可减缓农户暂时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消费贫困。综上,两种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本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不同计量方法下农户收入与消费贫困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

自变量	消费贫困动态类型				收入贫困动态类型			
	负二项回归模型		线性概率模型		负二项回归模型		线性概率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	-0.132 **	0.055	-0.304 **	0.123	-0.128 **	0.065	-0.242 **	0.121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0.042	0.656	0.147	1.287	0.061	0.698	0.021	1.146
人均房屋价值	0.011	0.089	-0.008	0.154	-0.105	0.089	-0.189	0.132
人均存款	0.016	0.376	0.056	0.739	-1.127 **	0.511	-1.573 **	0.741
人均借贷金额	0.213	0.246	0.377	0.444	-0.173	0.212	-0.146	0.301
人均耕地面积	-0.045	0.057	-0.105	0.127	-0.167 **	0.070	-0.293 **	0.119
人均林地面积	-0.025	0.045	-0.041	0.087	-0.016	0.046	-0.023	0.076
户主年龄	-0.003	0.002	-0.007	0.005	0.003	0.002	0.005	0.005

续表

自变量	消费贫困动态类型				收入贫困动态类型			
	负二项回归模型		线性概率模型		负二项回归模型		线性概率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14	0.009	-0.032	0.020	-0.006	0.009	-0.010	0.016
户人口规模	0.048 ***	0.017	0.108 ***	0.040	0.024	0.021	0.045	0.042
户劳动力数量	-0.054 **	0.024	-0.120 **	0.055	-0.066 **	0.031	-0.121 **	0.057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3.752 ***	1.273	-5.893 ***	2.144	-2.214	1.191	-2.643	1.757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0.812 *	0.475	-0.995 *	0.664	-0.419	0.352	-0.662	0.482
人均交通通讯支出	-3.684 **	1.786	-5.111 *	2.782	-0.824	1.865	-0.619	2.895
家庭是否兼业	-0.142 ***	0.043	-0.329 ***	0.104	-0.167 ***	0.055	-0.322 ***	0.111
常数项	1.137 ***	0.140	3.017 ***	0.342	0.901 ***	0.158	2.381 ***	0.315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2003年和2011年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发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具有显著的动态减贫效应。在消费流动性维度，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能显著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16.4%），其作用路径是使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减缓至暂时性消费贫困，而另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直接脱贫；在收入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明显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依次下降10.3%和2.9%），其减贫机理相对更复杂，除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外，还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先减缓至暂时性收入贫困后再完全脱贫，余下其他农户则从暂时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

上述结论对农村减贫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第一，以实施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为契机或平台，加快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实现借力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有机统一，彻底打破“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过去贫困治理多侧重经济层面的外在扶助，而漠视脱贫主体观念的转变和主观能动性的内在培育。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政府或社会支持是外因，贫困群体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因此，在不减弱或继续加大外界投入力度的基础上，还应调动贫困主体参与脱贫的积极性，才能达到扶贫的预期效果。第二，贫困性质、类型及其构成的多样性直接决定了扶贫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因此，政府应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和贫困人口的细分群体，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以增强不同农户应对收入波动或平滑消费波动的能力。例如，对慢性收入

贫困农户强化培育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四方面存量的政策举措；对慢性消费贫困农户重点实施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方面投资的政策举措。

参考文献：

- 蔡志海 (2010),《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农户生计资本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第55-66页。
- 陈健生 (2009),《生态脆弱地区农村慢性贫困研究——基于600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的监测证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丁冬、王秀华、郑风田 (2013),《社会资本、农户福利与贫困——基于河南省农户调查数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7期,第122-128页。
- 关爱萍、李静宜 (2017),《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第1期,第66-74页。
- 郭君平、吴国宝 (2013),《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的农户收入效应评价——以亚洲开发银行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第22-30页。
- 郭君平、吴国宝 (2014),《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影响评价——以亚行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例》,《经济评论》第1期,第38-46页。
- 郭圣乾、张纪伟 (2013),《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经济经纬》第3期,第26-30页。
- 何仁伟 (2014),《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第2期,第221-230页。
- 洪兴建、邓倩 (2013),《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统计研究》第5期,第25-30页。
- 李小云、董强、饶小龙、赵丽霞 (2007),《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第32-39页。
- 刘恩来、徐定德、谢芳婷、曹梦甜、刘邵权 (2015),《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2期,第60-65页。
- 孙梦洁、韩华为 (2013),《中国农村患者的医疗需求行为研究——来自三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第2期,第94-108页。
- 伍艳 (2015),《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128-133页。

- 伍艳 (2016),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 《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第88-94页。
- 徐晓鹏 (2016),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社区综合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亚行贵州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例》,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1期, 第91-97页。
- 杨慧敏、罗庆、许家伟 (2016),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经纬》第5期, 第42-47页。
- 杨云彦、赵锋 (2009),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第58-65页。
- 姚毅 (2012), 《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 《财经科学》第5期, 第99-108页。
- 于敏 (2011),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57-65页。
- 张清霞 (2008), 《贫困动态性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42-45页。
- 周振、兰春玉 (2014),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经济与管理》第3期, 第16-21页。
- Bane, Mary & David Ellwood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 (1), 1-23.
- Baumgartner, Ruedi & Rudolf Högger (2004). *In Search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ystems: Managing Resources and Chang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Chaudhuri, Shubham & Martin Ravallion (1994). How Well Do Static Indicators Identify the Chronically Po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3 (3), 367-394.
-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Herrera, Javier & François Roubaud (2005). Urban Poverty Dynamics in Peru and Madagascar, 1997-1999: A Panel Data Analysis.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10 (1), 21-48.
- Hill, Martha (1981). Some Dynamic Aspects of Poverty. In Martha Hill, Daniel Hill & James Morgan (eds.), *Five Thousand American Families: Patterns of Economic Progress*. Michig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pp. 93-120.
- Hulme, David & Andrew Shepherd (2003).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31 (3), 403-423.

The Dynamic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articip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onsumption and Income Mobility

Guo Junping, Qu Song, Xia Ying & Ning Aizhao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bstract: Using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marginal impacts and mechanism of particip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on farmers' dynamic poverty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umption and income mobility, based on three rounds of tracing 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wo poor villages in Nayo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has significant dynamic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From the consumption mobility dimension, particip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found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caught in chronic consumption poverty for farmers (16.4 percent), through relieving some farmers from chronic consumption poverty to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others directly being get rid of poverty from chronic consumption poverty. While from the income mobility dimension, particip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ld obviously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caught in chronic income poverty and contemporary income poverty by 10.3 percent and 2.9 percent respectively. But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complicated, which makes some farmers from chronic income poverty to non-poverty directly, and relieves some other farmers first from chronic income poverty to contemporary income poverty, and then to non-poverty, and also helps some farmers cast off poverty from contemporary income poverty.

Keywords: particip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mobility, income mobility, dynamic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influence mechanism

JEL Classification: I32, P36, O22

(责任编辑:周敏丹)